

## 壹、序論

隨著不登校問題日趨嚴重，在日本許多民間教育團體日益增加，但相對地政府的教育補救政策以及適應指導教室（等同臺灣的中途班）卻少之又少。所以此類民間教育團體因社會潮流而逐漸擴大規模的作法被指出是義務教育的私有化，意指所有脫離國家教育政策及路線的行為或作法將得由個人負擔風險，國家的義務教育機能將逐漸縮小，取而代之的是教育的自由與多元化（森田洋司，2003：17）。而造成如此現況，其實可以追溯至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所推廣的新自由主義教育，其最大特徵在於教育的私人化與市場化，以及學校制度和教育課程的多樣化（子安潤，1999：28-29）。此潮流也影響臺灣，包括近年來民間不斷主張教育自由化的重要性，而政府方面也開始進行局部的市場化。教育開放市場化後的自由競爭帶來的直接影響便是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因此臺灣與日本近年來都興起另類教育的風潮，而日本政府爲了因應這些特殊的教育理念而開始進行部分制度鬆綁。

依照日本文部科學省（等同臺灣的教育部）「學校基本調查」對於不登校（中譯爲「拒學」，truancy）的定義爲「基於心理上、情緒上、身體上或是社會因素與背景，造成學童無法上學，或是想上學卻無法上學（排除疾病與經濟因素）」，並且一年缺課30天以上即通報成不登校的案例。<sup>1</sup>多數人提及學生不去上學，則會聯想到怠學或是偏差行爲，然而若深究原因，其實大部分的學生並不全然是蓄意缺課，而是家庭背景、交友關係、學習成效甚至社會價值觀的交叉影響所造成。因此在處理不登校問題之際，實無法簡單地僅以單一因素來探究，而必須多方面考量後綜合判斷。然而現今的政府對應政策多著重於課業輔導與心理諮商，且最終目的是督促學生復學，並沒

---

<sup>1</sup> 本定義自1991年為文部科學省學校基本調查所採用。學校基本調查自1948年開始實施，1966年起將不登校學生人數列入調查項目，當時定義在「一年缺席50天以上的厭學者」。

有考慮到學生的個別性特殊需求。隨著不登校原因的多樣化，日本政府在無法因應現況提出即時政策對應的同時，使得近年來名為另類學校（free school, alternative school）的民間教育團體不斷增加中。

日本的另類學校興起於80年代後期，多數由關心不登校問題的相關人士（學生家長或是退休教職員等）所成立，活動場所往往僅借用公寓中的一室，屬於非正式結社立案團體，所以並無任何合法地位，這是有別於臺灣及歐美國家的地方。這些學校的活動目的在於「協助學生重拾自信並且提供身心支援與棲身之處」。不登校學生在此尋求與人溝通與學習的機會，家長之所以會願意額外付費則是為了尋求諮商與交換意見的場所，並且期望讓孩子得以培養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在這裡並不要求復學，也沒有通學年限，學生基於自身的意願隨時可以離開（東京都教育庁生涯学習部社会教育課，1999：11、30）。也因此日本的另類學校「與其說是自由學校，更不如說是專為不登校學生所成立的私人教育設施」（沖田寬子，1997：116），學校本身「是順應不登校學生人數增加所衍生的而來的」（坂田仰，2002：141）。

這些學校專門招收不登校學生，致力於拓展體制外教育，然而由於多數為私人結社，無法估計其具體數目，也不為世人所認同。礙於其非法地位，在營運上相當吃緊，主要經費來源來自於學費與募款，工作人員多為兼任或是志工，時常面臨活動空間不足、工作人員流動率高、欠缺活動合作夥伴，以及經費不足等困難（東京都教育庁生涯学習部社会教育課，1999：26；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03：70）。因此進入90年代後，曾經一度掀起另類學校為追求合法性與知名度而轉型為非營利法人（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的熱潮。

另類學校提供學生在正式學校以外得以暫行性緩衝上學壓力的場所，不僅成為學生與學校之間的協調中介點，同時也獲得許多家長的信賴。雖然另類學校成功地促使學生重新拾起課本學習並且恢復學習自信心，但是礙於其非法性與臨時中介站的定位，許多富有特殊教育理念的課程無法實現。最大